

“气场”失调:晚清留学生 被边缘化的人文解读

——以容闳、严复为例

李喜所

摘要 与晚清社会联系密切的留学生主要包括以容闳与严复为代表的留美幼童和留欧的海军生。清政府对留学生既想利用其一技之长,又恐惧其新思想冲击封建专制的矛盾心态和实用主义的用人方针,决定了留学生的“被边缘化”;留学生既想挤进官场发挥作用,又厌恶和难以适应清朝的官僚体系,由此决定了其与晚清政府的错位。导致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晚清社会没有凝练出适合留学生及其精英文化生存发展的良好气场。

关键词 晚清留学生 清政府 容闳 严复 被边缘化 气场失调

“气”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哲学概念,是借助医学上的“气血”,引申为形而上的精神之“气”,如“精气”、“灵气”、“浩然正气”等;“场”为物理学的术语,如“磁场”、“电场”等,延伸到人文领域,则指“软实力”的无形辐射所造成的强大社会力量。“气”与“场”合为一词,包含的是人格魅力、精神张扬和文化渗透,或个人、群体与社会互动过程中的人文“磁场”、人文生态、软环境、软实力等。其对个人、群体乃至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无处不在的“上帝”,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人生和民族的命运。晚清留学生的大多数之所以“被边缘化”,命运坎坷而诡异,归根结底是晚清社会没有升华出一个他们施展才华的气场。留学生大多有“气”无“场”。即使像容闳、严复这样的杰出人才,也难以进入社会的核心,总是处于“在野的地位”,孤独地先行。近代中国精英及其精英文化的这种困境,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公民社会的创建和先进文化的重构。

一、留学生与晚清社会的错位

留学生一般要经历两次反差较大的知识转换和文化重构。当其前往欧美或日本留学时,在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和适应异国社会文化的过程中,有一个转型过程;当其归国后,虽然回归于母体文化,但晚清社会文化与西方社会的巨大落差,还要迫使他们经历一次新的转换,烙上“中国特色”,否则就难以有所成就,甚至有生存危机。一般情况下,留学生适应西方社会文化比较容易,因为现代社会毕竟较多地体认人类的普世价值、尊重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而晚清社会,虽然拖泥带水地蹒跚地向近代前进,但专制集权的腐败官僚体制和缺失人文精神的文化生态,总是让留学生却步,很难找到合适的位置施展才华,只能在与社会的错位中讨生活,在没有现代“气场”的氛围中耐寂寞。容闳、严复的留学生活和归国后的经历足以表明,他们的两种文化适应,是喜剧和

悲剧的二重奏。

容闳从小在教会学校学习,对西方文化有一定的了解。他在美国的7年,从中学到大学,得到许多美国友人的帮助,切实感受到了西方社会较清朝的公平、公正,还体验了基督教文化的平等、博爱。容闳自然就把美国看作他的理想社会,希望把中国改造成“美国”^①。严复较容闳小26岁,他和容闳不同,从小接受严格的儒家文化教育,14岁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开始学习西方科技,23岁赴英国留学。严复在英国留学的3年间,饱览海军科学技术,探求欧美的社会政治文化,考察西方政治。其刚刚绽露的学识和才华受到郭嵩焘、薛福成、曾纪泽等清廷大员的高度赞誉。严复这时也和容闳一样接受西方文化,决心以英国为榜样去改造中国。

但是,当容闳、严复期望回国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既难以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更缺乏适合他们尽兴尽性的人文气场。于是,错位与碰壁接踵而来。

在19世纪50年代,容闳是唯一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具有现代知识和才能的杰出人才,但他不是公派留学,归国后即埋没乡间。为养家糊口,同时为了实现其向美国派留学生的宏伟计划,他开始了18年“打工”式的“流浪”生活。在广州、香港学中文、考察民情、找工作;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当翻译、当文书、做助理;前往南京太平天国寻求落足之地;贩卖茶叶,并试图办报纸、建银行、修铁路等。实践证明,晚清社会给一个留学生施展才华所提供的空间极其狭窄。尤其在一个官僚集权社会,权力主宰一切,没有官的支持,不是体制内的“人才”,任何事情都会变成肥皂泡。容闳最后还是与江苏巡抚丁日昌、当朝要员曾国藩建立联系之后,才于1872年实现了其派遣留学生的计划。但由于其不是翰林出身,只能做留美幼童的副监督,而由有功名的中规中矩、思想保守的陈兰彬来做监督。这时,从耶鲁大学毕业尚不是优势,反成缺憾。这样的价值取向,预示着留美幼童的悲剧,也使容闳难有大的作为。1900年,他曾一度出任中国国会的会长,但这种民间组织只是一帮文人的空想,无实际价值。此后,容闳开始与清廷对抗,竭力支持孙中山反清革命^②。总体来看,容闳一生与时俱进,但清政府却气数已尽,即使容闳才华横溢,也难找到施展抱负的社会平台。

严复是公派留学,归国后就被安排到母校福州

船政学堂任教习,第二年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先后任教习、会办、总办。但严复志不在此。在权力为核心的社会里,试图做事,就要做官。做官不仅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志,也是将理想变为现实的唯一手段。于是,严复一心向官位搏击。由于当时社会的士人瞧不起留学生,看重的仍然是科举翰林,所以,严复在天津刻苦学习《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还专程拜访古文大师吴汝纶,学作古文。经充分准备后,他4次参加科举考试,但皆失败。严复在与家人的书信中竭力抨击科举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终于明白要想做官,一要靠山,二要金钱,三要同党^③。严复在诗中说:“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少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④56岁(1909)时,严复被清政府破例赐予进士出身,终于圆了科举梦,但科举制已于前4年(1905)废除,真让严复哭笑不得!科举与做官,搅得严复一生不能安宁。

留学生经过西方文化的洗礼,看重的是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和科学精神,以及契约规则、公平竞争、和睦相处等。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和生活的时间越长,受这种思想文化的影响就越大,与清朝社会文化的隔膜就越深,回国后的适应就越困难。容闳就感觉在美国很亲切,中国反而成了“异邦”^⑤。这种思想文化的落差,使容闳不了解清朝的国情,无法洞察官场约定俗成的办事方法,更不清楚其中的潜规则。让他在清朝为官,难矣!其实,严复比容闳更不适合做官,尤其做清朝的官。他具有自由文人的本性,恃才自傲,口无遮拦,肆意评论朝廷。李鸿章器其才,让其“执弟子礼”,他一口拒绝。李鸿章外交失误,他出于公心,只要有机会,就大加褒贬。如此性情,即使科举成功,也难在官场混下去。严复一生的最高官位,就是北京大学校长,而且十分短暂^⑥。晚

① 容闳在其自传中讲,他1854年大学毕业时,就决心“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此为标准”(容闳《西学东渐记》,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62页)。

② 参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325页。

③ 《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31页。

④ 《严复集》第2册,第361页。

⑤ 参见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9页。

⑥ 严复1912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年底即去职。

清的留学生,大都具有容闳、严复这种文人骨气和文人性情,他们的“被边缘化”,自在情理之中。只有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深入,知识的专业化和学科的系统化,民主的规范化和职业的多元化,做官不再是体现自我价值的唯一选择,他们才可能寻找到发挥聪明才智的准确位置。所以,现代化的深度决定着留学生作用发挥的程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讲:“晚清西洋思想之运动,最大不幸者一事焉。盖西洋留学生殆全体未尝参加于此运动;运动之原动力及其中坚,乃在不通西洋语言文字之人。坐此为能力所限,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等弊,皆不能免。故运动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坚实之基础,旋起旋落,为社会所轻。”^①遗憾的是,他仅客观地指明了这种现象,却没有解剖其中的原因。

二、孤独的先行者

从总体上看,清政府对留学生很矛盾。一方面需要其才学和技能,促进洋务事业;一方面又惧怕其思想和观念的传播,动摇封建专制统治。留学生自身也是两难,既希望从清政府那里获得官位,实现理想和展示自身价值,又讨厌和本能地抵制封建官僚制度和官场规则。矛盾的清廷和两难的留学生相遇,必然是留学生的“被边缘化”。留学生处于“在野”的地位,被迫去寻求展现才华和价值的新途径。平心而论,像容闳、严复这样充满现代知识和文人性情的留学生,根本不适合在清朝做官,步入官场等于进了死胡同,根本不利于他们才华的发挥。而且,在晚清那样腐败的官场,他们也根本不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成就什么事业,不变成鱼肉百姓、贪污腐败的蠹虫,或不被官场的勾心斗角、相互挤压而丢官“获罪”,就算万幸了。从这个角度讲,容闳、严复的官运不佳和“被边缘化”,为其智慧的展示提供了新机遇。虽然他们成了孤独的先行者,曲高和寡,但容闳和严复却能紧扣时代脉搏,奋力拼搏,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容闳一生业绩不凡,但决定其历史地位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其百折不挠,促幼童赴美国留学。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开创了我国留学运动的先河,完成了实质意义的中美文化沟通,推进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进程,为晚清培养了现代化的人才;更深层的贡献

还在于,从此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对封建文化釜底抽薪,为旧文化的现代转化奠定了根基。通过留学不断涌现的现代人才,逐步置换传统文化,创造现代文明,加速了人们的觉醒和思想观念的进步。如果说洋务运动的正面影响在于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生产力,那么,容闳借助洋务事业,则延伸到了知识、人才和新国民的培育。梁启超等人的开民智、育新民,鲁迅等人的国民性改造,恰是容闳幼童留美创举的传承和更高阶段的发展。从文明的逻辑着眼,知识源流和知识结构,决定着个人、民族和国家的方向和面貌;人们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累积出什么类型的知识系统,就会有怎样的智慧、能力和追求,乃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其价值取向和理想建构,牵一发而动全身,决定着文明的面貌和特征。在幼童没有出国留学之前,除了几所低层次的洋务学堂,国人的知识源流和知识谱系基本上传统儒家那一套,幼童留学破天荒地打开了一个新天地,突破了几千年读“孔夫子书”的一统格局,国人的知识和技能发生了本质变化。容闳则十分幸运地成为推进这种划时代意义变革的关键人物,这比做清朝官员具有更大的历史价值。容闳的“被边缘化”,乃个人之福气,民族之大幸。

严复的惊人业绩是他的翻译。1895~1910年(41岁到56岁)的15年间,严复殚精竭虑,翻译了十多部西方的经典名著,其中有8部^②影响最大,为建构中国现代哲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逻辑学、法学、经济学等奠定了理论基础,给“学问饥饿”的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精神食粮。胡适、鲁迅、毛泽东等影响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伟人,都从严复的译著中收获了智慧和力量。尤其是那部脍炙人口的《天演论》,堪称现代《论语》,改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由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成历史观,转化为“天演”和“进化”;由“和为贵、忍为高”的惧怕和回避竞争的思维定势,转变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公平地讲,此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面貌,和《天演论》的潜移默化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

^① 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4、72页。

^② 这8部名著是《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名学》、《社会通论》、《法意》、《名学浅说》。

的联系。毛泽东称严复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如果说容闳的最大贡献在知识和人才方面,严复则更进一步升华到了思想和观念。令人感叹的是,容闳对自己的功业还有初步的体认,严复却毫无察觉,是在做官无门之后,不得已而为之,充满着无奈、埋怨和痛苦。这大概就是“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的二律背反,是人生的“异化”。

三、有“气”无“场”—— 精英与精英文化的困境

晚清和民国的精英,由早期容闳、严复这样的少数个体,逐步在“五四”前后发展为一个群体,主力则是受中西文化陶冶的留学生。晚清的留学生数量并不多,但能量很大,那些叱咤风云的佼佼者,大都有留学背景;民国时期留学演变成一种潮流,留学生和精英的关系更为密切,无论是政治、军事、经济、外交领域,还是思想、文化、科技、学术各界,留学生出身者皆占主导。由此可以推论,留学生群体,是近代中国精英的主要发源地;留学生文化,是鸦片战争以来精英文化的重要源泉;留学生的思想起伏、理想追求,在总体上展示了百年以来精英和精英文化的心路历程及发展轨迹。容闳和严复的“被边缘化”命运,也从一个重要角度,揭示了精英和精英文化的困境和归宿。

在近代,精英的最大特征,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始终;精英文化的主体面貌,是“亦中亦西”,融西方精神和中国特色于一体,展示人类的普世价值,追求人权、自由、民主、共和、博爱、法治,引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方向。这样的思想文化风貌,一旦与晚清、民国的社会实际相遇,就常常如容闳、严复这样时运不济,步步荆棘,很难被广泛认可,拓展为主流文化。个中原因,极其复杂,就其要害,在于“气场失调”,没有形成接纳和培育留学生为主体的精英文化的社会场域和文化生态。最典型的表现是,统治和被统治、专制与被专制、富裕与贫困的两极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改变,没有形成一个强势的中产阶级,并孕育出一个介于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中层社会,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公共文化场域,也就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先知先觉者所梦想的“中等社会”^①。按

陈天华等辛亥志士的设想,“中等社会”可以制约“上等社会”,提挈“下等社会”,是言论自由、激扬民气、揭露问题、呼唤正义、调节矛盾、医治社会创伤和推进“文明革命”、创建民主共和的必要条件。近代中国的“气场失调”,集中表现在“中等社会”的缺失,社会公共文化空间的狭小,留学生及其精英和精英文化较少立足的空间。于是,精英们大多成了孤独的先行者,变为有“气”无“场”的“英雄豪杰”;精英文化也被浓缩为少数人的“专利”,蜷缩在很小的范围内,无法进一步拓展。近百年中国所以“英雄”不断,与此不无关系。曾记得一位先哲讲过,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英雄辈出的民族则更可悲。信哉,斯言!俗语讲,乱世出英雄。英雄越多,精英都成了先行者,恰恰表明这个社会的问题很多,是“乱世”,而非一个成熟和谐、运作有序的现代社会。故而,英雄辈出的社会绝对不是安居乐业、喜乐祥和的理想社会。晚清或民国,容闳、严复那样的杰出人才变成了孤独的先行者,恰恰表明那个社会问题很多,缺乏留学生成长所必需的沃土和人才选拔的合理机制。要真正实现人尽其才,靠几个伯乐肯定会流于空想,根本在于良好的社会体制和文化气场。只有经过长期而艰辛的努力,创建现代公民社会,陶铸先进文明,追寻普世价值,像梁启超所期盼的,按“智”分享权力^②,才能保证优秀人才公开、合理地占据关键岗位,就再不会有或很少有容闳、严复那样的悲剧发生。

(本文作者:李喜所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王 贞

① 陈天华在《中国革命史论》(《民报》190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他们所倡导的革命和历代农民起义的根本区别是,他们是“中等社会革命”,是“文明革命”;历代农民起义则是“草莽革命”,是“野蛮革命”。湖南革命志士杨笃生则撰文告诫革命党人云:“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惟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张枏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15页)

② 梁启超早在戊戌变法时就提出按智分配权力:“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即有十分之权”(《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载《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30页)。